

敦煌遺書劉子殘卷集錄

張光年題



梁·劉 勰著

林其鏐 輯校
陳鳳金

敦煌遺書劉子殘卷集錄

張光年題



上海書店

责任编辑 陆国强
封面设计 李树德

敦煌遗书刘子残卷集录

梁·刘勰著
林其铨 陈凤金 辑校
上海书店出版
(上海福州路491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
上海影印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16 印张 225 插页 2
1988 年 10 月第一版 1988 年 10 月第一次印刷
印数 00001—00700

ISBN 7-80569-085-5/B·4

定价：精装 8.00 元

關於《劉子》

——在中國《文心雕龍》學會第二屆年會上的講話（代序）

張光年

《劉子集校》一書問世不久（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五年十月印行），許多同志可能未曾寓目。去年年底，我們大家尊敬的李一氓同志將此書作者林其鏊、陳鳳金贈他的一冊轉贈給我。春節前後讀過一遍，深服集校者用力之勤，考訂之精。我會一再與元化同志通函交換意見。元化也肯定林、陳二氏對劉子的整理、研究工作是嚴肅的，方法是對頭的。他認為其中個別重要論點還需要作進一步的論證。

我個人學業久疏，於劉子集校，算是粗讀了兩遍，只能對林其鏊、陳鳳金二位同志的工作，對他倆的治學態度和方法，表示贊賞和欽佩。我偏重於接受「劉子即劉勰」的見解，認為林、陳的考證是有根有據的。我至今還沒有看到強有力的確切論證，可以完全否定新、舊唐書、鄭樵通志的明確著錄，以及敦煌遺書的佐證。但我未經深入研究，沒有更多發言權，我只能說，粗讀之下，我相信劉子與文心雕龍二書，很可能出於一人之手。二書在政治見解、學術見解、文藝見解、人生哲學以及文體、文風等方面，都有不少驚人的相似處。劉子成書較晚，不時流露出日落西山、壯志未酬的老年人的慨嘆（見劉子集校第二九一頁），似乎在政治上、生活上飽經滄桑之後，作者對一些問題的看法更趨成熟了。關於劉子的作者及此書與文心雕龍的關係，林、陳二氏進行了詳盡的分析論證，提出了明確的答案，仍然虛心求教，希望專家、學者們進行深入的考證和研究，使這一歷史懸案早日得到澄清。我和元化同志提議同志們在會上或會後議論一下，各抒所見。越是提出疑點，找出矛盾，越是有利於問題的進一步深入研究和解決。我們的副會長、我所敬佩的老學者楊明照同志跟我們在一起。早在一九三八年，即將近半個世紀以前，他就發表了劉子輯注，對劉子一書研究有素。聽說楊老不同意林、陳劉子作者考辨的結論，他將在會上發表自己的見解。我想，即令是完全否定的見解，對後學者的進一步研究也是大有裨益的。

我認為，劉子和文心雕龍，同是南北朝歷史巨變時代產生的有重大歷史價值、學術價值的奇書。單就劉子來說，它包括作者的經世之學，處世之學，憂國憂民和個人遭遇的憂忿。雖然十幾個世紀過去了，今天讀起來仍然深受感動，有些地方簡

直震撼人心。我覺得，即令科學考證的最後結果，確證了此劉子非那劉子，此劉協非那劉勰，二人二書，在許多地方仍然可以互相參證，互相發明。研究劉子，對於深入地研究文心雕龍，研究劉勰時代和劉勰思想，定會有很大幫助。

我此刻特別感到興趣的，是劉子·法術篇提出的因時制宜的變法論。它這樣說：

是以明主務循其法，因時制宜，苟利於人，不必法古；必害於事，不可循舊。夏商之衰，不變法而亡；三代之興，不相襲而王；堯舜異道，而德蓋天下；湯武殊治，而名施後代。由此觀之，法宜變動，非一代也。（見劉子集校第八四頁）

這種因時制宜的主張，在本書卷九的隨時篇中，有了進一步的發揮。它直接批評了孟子的抱殘守缺，贊揚了商鞅的變法成功。它說：「以孟軻之仁義，論太王之去邠，而不合於世用；以商君之淺薄，行刻削之苛法，而反以成治。非仁義之不可行，而刻削之爲美，由於淳澆異跡，則政教宜殊，當合縱之代，而仁義未可全行也。」（見劉子集校第二四七頁）劉子本來是尊崇儒家的仁義之道，貶抑法家的嚴刑峻法的。但它更加反對的是：「今法者則溺於古律，儒者則拘於舊禮，而不識情移法宜變改也。」他鄙棄這種「拘禮之人，不足以言事。」（同書第八四頁）要知道，這是一千四百多年前的劉子的見解啊！我們今天聽起來，仍然感到親切有味。

劉子的因時制宜的變法論，和文心雕龍的文運日新的通變論，雖論題不同，思想方法是一致的。我指的不只是通變篇；一部文心雕龍，在論述文體、文風、文藝思想的演變時，處處都貫串着因時制宜的、歷史的、通變的、發展的觀點。針對六朝文風的嚴重弱點，劉勰主張「望今制奇，參古定法」，又要參古，又要創新。這在今天仍然有現實意義。劉子與文心雕龍，二書都表示宗經崇儒，或者說，都是儒學爲體、老莊爲用（或佛老爲用）的。它們的作者，從鞏固封建統治、照顧人民利益着眼，堅持改革變法，反對泥古保守，堅持通變革新，反對因循守舊。這符合當時社會大變亂中思想活潑、窮極思變的時代潮流；說明二書的作者，在政治思想、學術思想、文藝思想上，是站在時代潮流前面的勇士。

縱觀我國古代史，凡主張改革、堅持變法維新的人，多半是沒有好下場的，從商鞅、吳起、屈原、韓非……直到康有爲、梁啟超、譚嗣同，比比皆是；何況於門閥制度森嚴時出身地位貧寒的劉勰或劉協！所以我們在劉子一書中，看到他飽經滄桑、歷盡坎坷之後，嘆知音之難得、哀伯樂之難遇、激忿之言、悲痛之語，較之文心雕龍·知音篇，就激昂慷慨得多了。在劉子中，這類感傷激忿的文字，不是三篇五篇，而是隨處多有。值得注意的是，這類激忿文字，不僅是個人的牢騷，更多的是出於憂國憂民、爲國惜才的考慮。在薦賢篇中，開宗明義地說：

國之需賢，譬車之恃輪，猶舟之倚楫也。車摧輪，則無以行；舟無楫，則無以濟；國乏賢，則無以理。國之多賢，如託造父之乘，附越客之舟，身不勞而千里可期；足不行而蓬萊可至。朝之乏賢，若鳳虧六翮，欲望背磨青天，臆衝絳煙，終莫由也。（見

劉子把人才、賢才的重要性提到這樣的高度，難怪他對爲國進賢、獻賢、拔奇、擢能的善舉，極力表揚，而對非賢、抑賢、妒賢、蔽賢的惡行，大肆抨擊，乃至主張「獻賢受上賞，蔽賢蒙顯戮」了。這類地方，無論是正面側面的表揚，直接間接的批評，可看出都是有針對性的，是不避嫌疑、不計後果的，是勇士的語言。

劉子總結了歷史經驗，主張選拔人才，應從人處着眼，不可求全責備，因小過而棄大略。他說：「人之情性，皆有細短，若其大略是也，雖有小過，不足以爲累；若其大略非也，雖有衡門小操，未足與論大謀。」他指斥：「俗之觀士者，見其威儀屑屑，好行細潔，乃謂英彥；士有大趣不修容儀，不惜小檢，而謂之棄人。是見朱桔一子蠹，因剪樹而棄之；覩縵錦一寸點，乃全匹而燔之。」（均見同書第一五四、一五三頁）他所主張、他所指斥的，對於今天掌握幹部政策以及推薦人才、評論人才的人們，也還是有參考價值的吧？

劉子一方面悲嘆自己：「今日向西峯，道業未就，鬱聲於窮岫之陰，無聞於休明之世。」反復傷感於途塞、命乖、不遇、傷讒；他仍然在大質、激通、惜時等篇中，對命運的坎坷，力求採取達觀的、積極的態度。他列舉蘇秦、張儀、范雎、班超等人「因窘而發志，緣厄而顯名」的事例，說明「鳥激，則能翔青雲之際；矢驚，則能逾白雪之嶺。」勉勵自己：「以險而陟，然後爲貴；以難而升，所以爲賢。」（見同書第二八七、二八八頁）他嚴格地要求自己：「……丹可磨，而不可奪其色；蘭可燔，而不可滅其馨；玉可碎，而不可改其白；金可銷，而不可易其剛！」（同書第二〇五頁）這類自勵勸人的思想，在文心雕龍的諸子、程器、序志等篇中，也已露出端倪。這是屈原、司馬遷以來我國歷代忠臣、志士、傑出的知識分子的優良傳統。直到今天，對於從政者如何愛護人才，困難時如何對待自己，我看都是富於教益的。

我於劉子一書，本來說不出多少好見解。鑒於這部具有重要價值且與文心雕龍可以互相發明的奇書，唐以後就不大流行了，迄今更少爲學者、讀者所注意。感謝林其鏊、陳鳳金同志的辛勤勞動，感謝一氓老人的厚愛，我讀後獲益不淺。劉子集校一書是值得讀的。我樂於借此機會，推薦給諸位好學深思的同志們，以期引起研究、討論和進一步探索的興趣。我有小詩題贈林、陳二同志，祝願他倆在劉子研究上繼續奮進，在學術探討的攀山越嶺中取得更大成功。詩曰：

騏驎跨層巒，志在千里外。
放眼花果山，登臨成一快！

我們大家都以此共勉吧！

一九八六年四月十五日

敦煌遺書劉子殘卷集錄序

敦煌遺書乃中國近世所發現中古文化之寶藏，

品類繁多，藏量宏富，具有極大之文物價值與學

術價值，足窺我國古書之真面目。林君其銓陳君

鳳金伉儷合作，既成劉子集校一書，馳譽中外，繼

而從事于敦煌遺書劉子資料之蒐集整理，輯錄成

殘卷六種，其中一種係傳沈林丈

增湘

據劉希亮影

寫唐卷子本劉子之校本為敦煌遺書總目所未錄著

錄，並加標點校訂，題曰敦煌遺書劉子殘卷集錄。商由上海書店景印問世，對學術研究有深遠意義。

劉子一書，著於隋志，而虞世南北堂書鈔、釋道宣廣弘明集、唐太宗帝範、武后臣軌、釋道世法苑珠林、釋湛然輔行記，多數徵引，是必盛行于隋唐。觀于敦煌寫本之多，足證當時流傳之廣，習者之眾。日本國見在書目（此目撰於日本寬平年代，相當于我國唐昭宗之世）雜家類有劉子十、劉子三、劉子五之著錄，可知其

至遲在晚唐即已傳入日本，且傳本有三種之多。蓋此書在隋唐時流傳已廣，究其原因，在於思想之通達，文字之流暢。吾友王有三君重民嘗云：劉子是總結了古代諸子的學術和思想，來用古說今，對當時社會來說，是有一些現實意義的理論著作。

劉子作者為誰？隋志僅書梁有，而未題作者；唐志始著錄劉子十卷，劉勰撰。唐釋慧琳一切經音

義亦有劉勰，梁朝時才名之士也，著書四卷，名劉子。
之記載，今在敦煌遺書隨身寶鈔本中，均有離騷
經屈原注，流子劉勰注之著錄，伯三六三六卷中九流條
下，著有劉子第五十五九流篇，並注事在流子第五十五
章，是證唐人稱為流子者，即今之劉子也。有三六云：流子
就是劉子，劉勰當即劉勰，而唐志並著錄劉子十卷，
劉勰撰，到今天還在流傳。因就今日可見唐人著錄，
皆以為劉子，劉勰著，此我國歷史記載已甚明確。又

日本新雕劉子五卷，為日本寶曆八年（相當我國清

乾隆二十三年）刊本，所據為日本應永（相當我國

明洪武年間）寫本，亦明題梁劉勰著。首有播磨清

鉤、平安咸願，末有城南滕璋等序跋，悉稱劉子劉

勰所作。可見海外流傳，不僅亦已久遠，而作者誰屬

亦甚明確。其鈇鳳金輯劉子敦煌本影印傳播，將

供研究劉子作者及版本問題者，釋疑解惑之良助。

敦煌遺書殘卷六種，及著錄資料五種，寫本年代

始自隋朝迄於五代，其中多存六朝古字，唐寫別體，書法之工整者，秀麗多姿，猶具褚薛之風韻，亦可供從事楷法者之借鑒。

其鈔鳳金，努力于古籍整理之業，孜孜不倦，每承枉顧，頗聞校讀所得，益我良多。今敦煌本劉子輯錄成書，行將出版，忘其耄荒而樂為之序。

一九八八年一月 顧廷龍時年八十有五



前言

一

一八九九年（清德宗光緒二十五年己亥），是中國和世界文化史上值得秉書的一年，因為在這一年的五月二十五日（註一），只是由於偶然的原因，在中國甘肅省敦煌縣鳴沙山千佛洞，打開了被封閉達九百多年之久的第二百八十八石窟，發現了極為豐富的中國中古文化典籍寶藏，獲得了具有世界意義的無價精神財富。這裏不僅儲藏了大量的釋道儒三家經藏，而且是文學藝術、醫藥術數、天文曆算、中外交通、公私文書無所不包。由於宏富新資料的湧現，導致了一個具有綜合性質的新學科——「敦煌學」的產生，其影響所及，遍於古籍整理、文史藝術、語言文字、科學宗教。遺憾的是：當此寶藏被發現之際，正值中國處於內憂外患交至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時期，清政府的腐敗，封建官僚的昏庸，列強的侵凌，國外考古者的覬奪，遂使這曠世的遺珍支離四散，至今散落於近十個國家和地區的公私藏書家手裏，這是中國文化史的悲劇。

敦煌寶藏究竟有多少？至今難以確計。據王重民統計，約在二萬七千件以上，至多不超過三萬件（註二）；台灣省黃永武博士的統計，數字也基本相符（註三）。在這數量巨大的中古文化典籍中，佛道經典佔大多數，經、史、子、集四部書的數量並不多，「在已知全部漢文寫卷中，還不到百分之三，大約不過六百卷的樣子。」（註四）但是，劉子殘卷却有六種（包括殘篇），而對於劉子一書的著錄材料也有五種之多。從六種劉子殘卷所存篇數看，累計篇數有三十一整篇八個殘篇；不重復篇數則有二十四整篇兩個殘篇，佔全書五十五篇的百分四十三點六強。從抄寫時間看，起於隋朝，迄於唐開元、天寶年間。其著錄材料，則從晚唐而迄於五代漢隱帝乾祐三年。這是現存最古的劉子版本和著錄直證，比對後來刊行諸本，異字佚文不可勝計，確如傅增湘氏所云：乃「天地間奇寶」，「昔人動侈千元百宋，視此又何足云云耶！」（註五）

二

現存的敦煌遺書六種劉子殘卷包括：被法人伯希和劫奪，今藏於巴黎國立圖書館的四種，編號為伯三五六一、伯二五四六、伯三七〇四、伯三六三六；原為何穆恣所藏並為傅增湘、羅振玉校錄之劉子殘卷；原為劉幼雲（廷琛）所藏為傅增湘校錄的唐卷子劉子。

伯三五六二卷，起韜光第四之後半，迄法術第十四之開端，計九整篇，兩個殘篇。每行十七、十八、十九、二十字不等。此卷從韜光第四之後半，到思順第九之前半，同羅振玉校錄劉子殘卷重疊，從愛民第十二至法術第十四之開端，同傅增湘校錄劉藏唐卷子劉子重疊。此卷不避唐諱，而後兩卷皆避唐諱。如崇學第五「學爲禮儀，雕以文藻，則世人榮之」，羅卷「世」作「代」。辯學第七「三王異世，不相襲禮」，羅卷「世」亦作「代」。凡「民」字，傅增湘校錄劉藏唐卷子劉子并缺末筆作「尸」，而此卷則不缺避。爲此，傅增湘認爲：此卷「民」字不缺避，當爲隋時寫本。」（註六）王重民則認爲：「此卷不避唐諱，當出於六朝之末。」（註七）今細驗此卷別構字，實多六朝古字，如「姦」作「奸」，「條」作「櫟」，「桑」作「葉」，「燥」作「燥」等。但亦多與隋碑別字相同者，如「乘」作「乘」，「怨」作「怨」，「算」作「竿」等。據此，傅增湘斷爲「隋時寫本」似較平實。此卷乃是今藏劉子之最早寫本，從其行間及卷末空白處，後人塗鴉文字「至心歸依十方道寶」，「□□也恭忝秘本」情況看，當此卷被佛教徒獻給敦煌寺廟時，即已被作爲秘藏的古本，其可貴由此可知。

伯二五四六卷，起鄙名第十七，迄託附第二十一之前半，（審名第十六末句尙殘存五個半字），計四整篇，一殘篇。每行三十、三十一字不等，字小行密，然頗清秀，鄙名第十七殘損比較嚴重。從鄙名第十七起至薦賢第十九之前半，同傅增湘校錄劉藏唐卷子劉子重疊。此卷避唐諱，「世」作「代」，「民」作「人」，「治」作「理」。如鄙名篇「邑泉之大，生人所庇」，傅錄劉藏唐卷子劉子「人」作「尸」。知人篇「堯遭洪水，浩浩滔天，蕩蕩懷山，下人昏墊」，傅錄劉藏唐卷子劉子「人」亦作「尸」；「名尊而身顯，榮滿於當代」，刊本「代」作「世」，傅錄劉藏唐卷子劉子缺末筆作「世」。薦賢篇「國乏（此卷作渴）賢，亦無以理」，傅錄劉藏唐卷子劉子「理」作「治」。關於此卷書寫年代，王重民根據「於唐諱「世」之字爲「代」，「治」之字爲「理」，斷定它「寫於開天之世也」。（註八）

伯三七〇四卷，此卷起風俗第四十六，迄正賞第五十一，計六整篇，恰得百行。每行從二十五字到三十二字不等。此卷於唐諱亦避，如風俗篇「民習而行，亦爲之俗焉」，「民」作「人」。正賞篇「鄙人爲賦，託以靈均，舉世而誦之」，「世」作「代」。貪愛篇「及葉公入」，「葉」作「葉」。王重民認爲此卷與二五四六號卷子當是同卷，爲開天時寫本。並舉禍福篇「善行則禍轉爲福」，今本誤作「善言則福轉爲禍」；貪愛篇「出府庫之兵以賦人」，今本「賦」誤作「賜」；類感篇「彈角而木搖，鼓羽而波湧」，今本誤作「彈角則目搖，鼓舟而波湧」；正賞篇「棄法以度物情」，今本誤作「模法以度物爲情」等四例，以證「此卷子本之善」（註九）。至於此卷是否與二五四六號同卷？從兩卷每行字數之參差，字體別字之有異等看，似未必屬於同卷。

羅振玉校錄何穆藏劉子殘卷，起去情第三之後半，迄思順第九之前半，計五整篇，二殘篇。據羅振玉稱：「每行十五六字」。此卷原件已不知下落，有羅振玉校錄本和傅增湘校錄本在。羅振玉校錄本於一九二四年印敦煌石室碎金時收入。據

羅振玉劉子校記跋稱：「壬戌（一九二二年）秋得於江陰何氏。」傳增湘於「甲寅（一九一四年）大春節」寫的劉子跋云：「何穆志藏唐卷子本劉氏子二百八行，蓋敦煌石室之祕笈也。存者只得全書十之一，然異字佚文乃至不可勝計。」（註十）今比勘羅振玉校錄本和傳增湘校錄本，發現起點一致，而迄處傳增湘校錄本比羅振玉校錄本多一百四十二字。羅振玉校本迄於思順第九「山海爭水水必歸海」，傳增湘校錄本迄於思順第九「尾斷腹裂不行十步若環桑之條以」。其中文字亦略有異。由此可知，此卷原為何穆志收藏，先為傳增湘校錄，後為羅振玉所得并校錄排印。時隔八年多，而寶貴之古文獻又損失一百二十四字，以每行十五字計，則又殘佚九行之多。至於文字略有參差，可能是由於兩人校錄筆誤所致。此卷避唐太宗諱：崇學篇「學為禮儀，雖以文藻，而世人榮之」，「世」作「代」；辯樂篇「三王異世，不相襲禮」，「世」亦作「代」。羅振玉以為：此卷書勢頗縱逸，有褚薛遺意，與經生書體謹飭者不同，始出初唐人手。（註十一）

傳增湘校錄劉希亮寫劉幼雲藏唐卷子劉子，起愛民第十二，迄薦賢第十九之後半，計七整篇，一殘篇。此卷原件下落不明，僅存傳增湘「乙卯四月」（即一九一五年）據劉幼雲（廷琛）長子劉希亮的影寫本校錄下來的本子。據傳增湘「已卯四月初九日」的記錄，此卷「共有二百四十行，每行十七八字不等。此卷舊為劉幼雲所藏，即從何秋聲家解經委員分得者，昔年在青島曾屢借不得。昨其長君希亮以影寫本見跡，因校於鄂局百子本上。」（註十二）劉世兄希亮，以影寫唐卷子劉子見跡，凡二百四十行，自愛民起至薦賢止，凡八篇，移校於此本（按：指光緒紀元夏月湖北崇文書局開雕之兩卷本劉子）上，合之何氏及法人伯希和所藏，通得二十一篇，已得全書三分之一矣。（註十三）此卷與敦煌遺書總目索引著錄的四種劉子殘卷（伯三五六二、伯二五四六、伯三七〇四及羅振玉校本）比較，有兩點明顯不同：（一）起點和迄點全不合，其中賞罰第十五、審名第十六兩整篇，法術第十四之後半篇，為其他諸卷所沒有。（二）文字不同。此卷前半有愛民、從化兩整篇和法術之開端，與法藏伯三五六二卷重疊，後半則有鄙名、知人兩整篇和薦賢之前半，同法藏伯二五四六卷相重疊。將重疊部分加以比勘，便會發現其佚文異字相去甚遠。例如：（1）此卷避唐太宗諱，不避唐高宗諱，凡「民」字均缺末筆作「尸」，「治」字不避。而伯三五六二卷「民」字不缺避，伯二五四六卷則改「治」為「理」。（2）愛民篇「霜露未霑」（據程榮本，下同），此卷「霑」作「凝」，伯三五六二卷作「降」；從化篇「從君所好也」，此卷作「從君所好欲使之然也」，伯三五六二卷作「從君所欲也」；「豈能一於萬民哉」，此卷「萬民」作「萬物」，伯三五六二卷作「萬姓」；「殷紂在天下皆亂」，此卷「在上」作「臨民」，伯三五六二卷作「在位」。（3）鄙名篇「里名勝毋曾子還輟」，此卷「還輟」作「拔劍」，伯二五四六卷作「按劍」；「追風逐電絕塵滅影」，伯三五六二卷相同，此卷則作「追電逐括離影絕塵」。異字佚文相違之處遠不止這些。由此可見：此卷不同於前四種，是一種未被敦煌遺書總目索引所著錄的唐寫本劉子殘卷是無疑的。至於此卷寫於何時？從「民」字缺避，而「治」字不避改情況看，抄寫時間亦當

在貞觀之世，亦「殆出初唐人手」。

伯三六三六卷，此卷爲雜抄，似類書，錄九流第五十五（缺末段）和風俗第四十六中間一段。據王重民云：「此卷長可兩丈，首尾殘缺，書名不可知。」閱其內容，似爲類書，然編次無法，且無類目，頗似學人之讀書筆記，以備擇擷者。所引佚書，經類有五經通義、易乾鑿度，史類有東觀漢記、晉朝雜事、前涼錄、河西舊事、宋元嘉起居注、孝子傳、皇甫謐高士傳、益部耆舊傳、袁山松宜都山水記、王孚安城記、裴淵廣州記、雷次宗豫章記、荊州圖副、梁州記、武昌記、嵩山記、外國圖，子類有魯連子、汜勝書、世說、相冢書等。可見古人學問之博與見書之多，雖非著述，在今日觀之，已爲圖書淵府矣。又卷中「九流」一條，目下注云：「事在流子第五十五章」。然依其家數，錄新論九流篇原文於次。唐人稱劉子爲流子，今在二七二一與三六四九兩卷中並見之，雖未得其解，而此卷又引作「流子」，唐人固有此稱也。（註十四）此卷今存六十七個條目，其款式是：條目大字領頭，小字釋文，末註出處。在「九流」條下，又以道、儒、陰陽、名、法、墨、縱橫、雜、農大字領頭，全錄劉子「九流篇」（缺末段）；在「四異」條下，錄劉子「風俗篇」的一段。考其文字，避唐太宗諱，而不避高宗諱。「民」字缺末筆作「𠂔」，或改爲「人」，而「治」字不缺不改。例「黃向」條「治政多恩，民庶無怨」，「民」作「𠂔」，「治」不缺改。「趙廣漢」條「家給民足」、「治績難繼」、「吏民守闕」，上「民」作「人」，下「民」作「𠂔」，而「治」不缺改。據此，此卷當亦寫於貞觀之世，出初唐人手。

三

劉子作者誰屬，自南宋以降已經聚訟了五、六百年，劉子書也因此而遭冷遇。考察史實，在隋唐以迄於五代，此書被當作「一般性理論讀物」，在社會上是頗受重視和流行的；對於此書的作者，據今日直接能見到的史料，著錄也是明確的。

現存的文獻表明：最早徵引劉子的是北堂書鈔。此書卷十三、卷二十七、卷一百二十二、卷一百二十六、卷一百四十四、卷一百二十九，共有七處徵引劉子，並明確標明「劉子」或「劉子云」。北堂書鈔的編撰者是虞世南，他是隋內史侍郎虞世基之弟，少與兄世基受業于吳郡顧野王，仕陳。入隋，大業中爲秘書郎。北堂書鈔便是他在隋朝大業年間爲秘書郎時所作。北堂者，卽隋秘書省之後堂也。唐人劉餗隋唐嘉話說：「虞公之爲秘書，於省後堂集羣書中事可爲文者，號爲北堂書鈔。今此堂猶存，而書鈔盛傳於世。」宋人晁公武郡齋讀書志也說：由於北堂書鈔是「虞世南仕隋爲秘書郎時抄經史百家之事以備用」，「故書中避隋諱，如『堅』作『牢』、『固』、『勞』、『至』、『剛』，或作『永固』；『廣』作『闊』、『大』、『博』、『開』等。」其次便是釋道宣撰的廣弘明集。該書卷十三九篇兩處直稱「劉子云」，徵引劉子的適才篇和審名篇，後者是同直稱「文心云」的文心雕龍。知音篇並引的。釋道宣是中國佛教律宗的創立者，十五歲出家，隋末居終南白泉寺，入唐後曾參加玄奘譯場，後爲西明

寺上座。『廣弘明集』撰述最早，尙在中年晦迹終南時。〔註十五〕其成書亦在隋時。唐初，劉子亦廣被徵引，今可見者，有唐太宗撰的帝範，武則天撰的臣軌，當時社會上頗流行的小類書如敦煌殘卷伯三六三六卷雜抄，還有釋湛然撰的輔行記等。署『唐太宗文皇帝撰』的帝範十二篇，是唐太宗貞觀二十二年（六四八）撰的賜太子李治的。在這本以『披鏡前蹤，博覽史籍，聚其要言，以爲近誡』〔註十六〕的篇幅不大的著作里，明顯襲用劉子的就達二十二處，直接以『劉子曰』徵引入註的也有十條之多。關於帝範的註者，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云：『唐書·藝文志載有賈行註，而舊唐書·敬宗本紀稱：『寶曆二年秘書省著作郎韋公肅註是書以進，特賜錦彩百匹。』是唐時已有二註。今本註無姓名，觀其體裁，似唐人註經之式。』〔註十七〕此外，武則天撰的臣軌也摘引劉子·清神篇入文；釋湛然撰的輔行記，也摘引劉子·韜光篇、劉子·崇學篇入文。特別值得重視的是，在敦煌遺書中，不僅有五種劉子殘卷，而且寫于初唐的伯三六三六卷雜鈔，在『九流』條和『四異』條下，全錄了劉子·九流篇的絕大部分和風俗篇的第三段，並在『九流』目下註：『事在流子第五十五章』。由此可見：唐人稱流子者，即今傳之劉子也。

關於劉子的著錄，始見於隋書·經籍志，但只有『梁有劉子十卷，亡』的記錄，未及作者姓氏。後爲舊唐書·經籍志所本的，成書于開元九年（七二一）的羣書四部錄（舊唐書·經籍志直接依據是古今書錄，而古今書錄則是羣書四部錄的簡本），則本着『只記其有，不記其無』〔註十八〕，『空張之目，則檢獲便增』，『紕繆咸正，混雜必刊』的方針，『改舊傳之失』〔註十九〕，明確著錄：『劉子十卷，劉勰撰。』盛唐時期的釋慧琳撰一切經音義，也明確記載：『劉勰，梁朝時才名之士也，著書四卷，名劉子。』宋高僧傳稱：『釋慧琳，內持密藏，外究儒流』，引用『諸經雜史參合佛意，詳察是非撰成大藏音義一百卷，起貞元四年（七八八），迄元和五載（八一〇）方得絕筆。』日本古代僧人天照山方丈在新雕大藏音義序中也說：『議者以爲：詰訓之府無出琳之右矣。』

特別難得的是，在敦煌遺書中也留下了劉子的著錄材料，即題爲『雜抄一卷，一名珠玉抄，二名益智文，三名隨身寶』者。據查，此種隨身寶在敦煌遺書中有六種抄本，即伯二七二一卷、伯三六七一卷、伯三六四九卷、伯二八一六卷、斯四六六三卷、斯五六五八卷。其中除伯二八一六卷殘佚之外，其他五卷皆有：『離騷經，屈原注；流子，劉協注』的著錄。關於這類雜抄的性質及其著錄的本義，王重民說：『雜抄是唐末農村和城市居民中流行很廣的一部小類書，因爲對農民和城市居民來說非常實際，非常有用，他們又把它叫做珠玉抄或隨身寶。其中有一節是用問答的體裁給青年士子們開列的一個書目單。這個書目單應該說是我國現存最古的一個推薦性的學習書目了。敦煌出土的雜抄有許多寫本，茲依伯二七二一卷子移錄原文如下：『……離騷經，屈原注（著）。流子，劉協注（著）。……典言，季德杜撰之。……』這個書目單雖說很簡單，排列的好像也沒有次序，不成系統；可是我們若是根據當時的社會情況，一般人的讀書需要，和在科舉的嚴重影響之下，所造成的學習